

浅谈分子人类学研究的人文意义

周建新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南宁 530006)

提 要: 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 对文化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以生命遗传的科学结论, 进一步印证或否定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使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二是可以从生命遗传科学的角度, 证明世界各民族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纯洁的种族或民族。人类共同“走出非洲”假说的成立, 证明世界上不同的种族或民族, 在起源和生命遗传上是有交融的。我们既然从生命遗传上都可以融合,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文化特质上进行交融, 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多民族的人类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文化人类学反对各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最为重要的科学依据。另外, 作者提出环境和文化是否对人类遗传特征构成影响的问题, 供学界同仁讨论。

分子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领域, 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此分支的研究对象、方法、途径等与普通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有质的区别。传统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往往注重文献资料和口传历史等, 提倡田野调查, 想从各民族的口传历史或文化“残余”中, 寻找昔日的辉煌或重塑历史。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各民族起源等远古历史问题时, 有着明显的缺陷, 因为其基础往往是建立在归纳和推理之上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兴起, 为弥补文化人类学的这些不足, 提供了可能。由于其研究成果是建立在生命遗传科学的基础之上, 因此对文化人类学长期难以解决的各民族起源问题, 有着重大的人文意义。

目前, 我国虽然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上, 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但以分子人类学研究为龙头, 进行多学科交叉与整合综合研究的机构还没有。“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 必将在我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并成为分子人类学研究率先成立的重要研究基地。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自然有着其无可替代的生命科学价值, 但针对文化人类学而言, 它的研究成果同样有着非常重大的人文意义。笔者认为,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 分子人类学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有以下两点重要意义: 一是为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供新的生命遗传科学证据。通过科学的结论, 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是通过生命遗传科学的结论, 证明人类在生命遗传特征上是相互交融的, 表面上共同文化特征的族群, 可能由不同遗传特征的群体组成; 实质上具有共同遗传因子的族群, 可能并不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们是可以通过通婚实现遗传因子结合的, 世界各民族是可以友好共处的, 各种文明是不需要通过“冲突”才能走向“和平”的, 各民族文化是完全可以共生而互不相害的。

—

人类起源和迁徙过程是无数科学界先人孜孜以求, 不懈探索的问题。

过去, 我们依据考古学证据, 民间文学证据, 对人类起源和迁徙问题进行研究, 但由于受到研究材料年代久远, 不易获得, 信息量少和研究方法有较强的主观性, 标准不一

等不利因素的限制，人们已经意识到单纯使用传统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手段来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迁徙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在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自身包含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忠实的记录了人类历史上众多事件，研究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迁徙问题的最佳证据将来自现代人类本身。这为我们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迁徙问题开辟了一个更加科学的领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即所谓的“走出非洲”假说。这对文化人类学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中，我们经常探讨各民族的族缘问题，有时针对某个民族的族缘问题争论不休，但最终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结论大多是通过各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相关历史文献而得出的，有些甚至是通过推理而得出的，因此谁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根据。

而分子人类学为研究群体遗传学，特别是人类起源与迁徙，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根据。

如果我们把从长江流域挖掘出土的古人类遗骸与现代苗瑶人群进行 DNA 比较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的一致性。这就可以进一步证明，我国古代传说的苗瑶起源于长江流域的说法是正确的。

当然，这里笔者无意过分强调分子人类学的参考价值，更无意否定文化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科学性，而且笔者确信，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只是在出现争论的时候，我们无法从文化人类学本身研究的领域再找到更加充分的证据，来说服别人。过去，这样的争论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分子人类学研究出现以后，许多科研成果从生命遗传的科学角度，确认了各文化族群之间的生命遗传联系，甚至从考古挖掘出的古代人类遗骸中，找到了其与现代人类生命遗传的 DNA 联系。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给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使过去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加令人信服，给文化人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更加广泛的科学证据，使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有了更加科学的依据。另一方面，有些相关研究成果，否定了个别过去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有些是根本性的否定。这对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产生动摇，也使得许多学者一时难以接受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但科学毕竟是科学，我们不能够用怀疑代替科学。

复旦大学金力教授及其学生，在分子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许多成果，为我国文化人类学关于各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生命遗传科学的证据。

二

笔者认为，以下将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具有重大人文意义。

我们在从事田野调查中，经常发现一种现象，即有些被证明不是某个族群的人们，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那个族群的一分子。虽然，我们是通过家谱，或者其他历史材料证明这一切的，似乎是缺乏科学权威的。但是，现在我们进一步通过分子人类学的手段证明，事实的确如此。

上海复旦大学的李辉博士在广西做田野调查时，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他在为一个家庭所有成员做过血样分析后，发现这个家庭的长子不具有这个家庭父系的生命遗传因子，但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显然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视角，这个家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浪漫故事，而这一切是通过分子人类学的科学结论所发现的。我们以职业的道德和良心不

能打破这个秘密，但推而广之，假如我们从一个大的族群或一个大的民族来看，同样的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

笔者在从事中越中老跨国民族的研究中，就发现许多族群的内部成分是复杂的，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有些族群之间，本来是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的，但彼此之间在文化上却相去甚远。金力教授及其学生已经从基因组上证明，汉族与藏族的主体是有非常相近的同源关系的，都是古代氐羌部族分化形成的。由此可见，生命遗传特征与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他们之间所表现出来的世相是丰富多彩的。因此，我们从世界上现存的大民族来看，毫无疑问，已经没有任何纯洁的种族或民族存在了。过去，由于文化特质的相同或相似，掩盖了族群生命遗传成分的复杂性，种族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可以以纯洁种族或民族为诉求，制造种族仇恨，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在今天，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仍然在世界各地横行。

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兴起，其成果以无可辩驳的科学结论，否定了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泛滥的思想基础。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反对任何形式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一把科学利剑。

三

生命遗传因子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因素，社会文化传统是后天习得的，是后天的因素。这是我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我们确实看到一些环境和文化因素影响人类体质变化的表征。例如，一个农耕民族的孩子，从小被一个游牧民族的家庭带大，其在体毛发育等方面与原有家庭成员的体质特征有较大差异。

在讨论分子人类学对文化人类学研究重要意义的同时，笔者最后想提出一个曾经被否定的简单的问题，但又是人们普遍关心而难以得到准确回答的问题。在本次会议的议题中有一个内容是“人群体质特征和遗传特征的相关性研究”，由此，笔者再次想到了环境和文化对人类遗传体质特征的影响问题。有句英文说“*We are what we eat*”，似乎很有道理，笔者想问“长久的环境和社会文化活动是否会影响人的生命遗传因素？”